

深度贫困地区持续减贫长效机制研究

——基于可行能力视角

李剑芳¹, 李 鲁²

(1. 南京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95;
2.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 北京 100026)

摘要:深度贫困地区多位于地势复杂的偏远地区, 远离城市和经济增长点的辐射, 自然条件恶劣、经济基础薄弱, 在脱贫攻坚决胜阶段的新形势下仍是脱贫攻坚的重点和难点。基于可行能力视角, 从自然环境、社会因素和个体层面三个方面分析了深度贫困地区致贫机理, 并基于贫困陷阱的生成机制理论解释可行能力提升对长效减贫的作用, 并从如何加强深度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 发挥产业带动作用、激发贫困人口内生动力、提高贫困治理的精准度等方面探索构建持续减贫长效机制。

关键词:可行能力; 深度贫困地区; 长效减贫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092(2021)02-0035-07

截至2019年, 全国农村贫困人口从2012年末的9899万人减少至551万人, 累计减少9348万人, 贫困发生率从2012年的10.2%下降至0.6%, 减贫工作取得显著成就。在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战略衔接的关键时期, 深度贫困地区成为新时期减贫工作关注的重点。深度贫困地区位于山区居多的偏远地区, 远离城市和经济增长点的辐射, 自然条件恶劣、经济基础薄弱, 在绝对贫困即将终结、相对贫困持续存在的新形势下, 深度贫困地区持续减贫仍是脱贫攻坚工作的重点和难点。打好脱贫攻坚战仅依靠政府主导的外界力量, 并不能保证减贫的长效性和可持续性, 解决贫困问题更应从贫困人口的内部着手, 激发深度贫困地区贫困群体的内生动力, 才能保证脱贫不返贫、贫困户脱贫后实现持续发展。建立可行能力与脱贫相结合的观念和视角, 强调内源式扶贫, 化“输血”为“造血”, 在细化产业带动作用的同时促进资源要素的合理配置, 扩大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有机结合, 激发内生动力、提升可行能力是长效减贫的关键。本文以可行能力为视角, 探究深度贫困地区致贫原因的形成机理、剖析贫困陷阱

的生成逻辑, 旨在推动深度贫困地区减贫长效机制的构建。

一、深度贫困地区致贫原因探析

深度贫困地区呈现多维贫困交织、多种致贫原因并存的局面, 精准分析贫困人口的致贫原因有利于高效识别、精准治理。贫困产生原因受地理位置、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代际传递等因素多重作用, 主要归纳为自然环境、社会因素和个体层面三个方面。深入分析深度贫困地区致贫机理, 有助于根据贫困地区的贫困特征和具体致贫原因制定相应帮扶策略, 进一步剖析贫困陷阱的生成逻辑, 优化扶贫资源的配置效率。

1. 自然环境的致贫机理

自然禀赋学说是解释深度贫困地区致贫原因的首要机理, 土地等自然资源的匮乏、资源结构不合理、资源开发缺乏可持续性以及自然资源浪费且利用效率不合理等问题导致深度贫困地区缺乏生产动力。深度贫困地区多集中在地势险峻、气候恶劣区域, 多以农业生产为主, 农业生产效率受自然环境影响, 受气候和自然灾害风险的影响导

致极不稳定且投入产出率比较低,进一步导致现代农业发展进程受阻,扩大生产速度缓慢,一旦碰上地震、泥石流等灾害年就会引发根本性贫困^[1]和老式贫困。^[2]

深度贫困地区多积聚在“老、少、边、穷”的边远地区,远离发达经济中心的辐射和城镇产业的扩展腹地,受地理位置和地理环境的影响,深度贫困地区很难发展非农业产业,贫困农户难以获得农业以外的经营性、财产性收入。另外由于交通闭塞、信息不畅,偏远地区农户很难获得及时、准确的市场信息,农户经营性生产的经济效益受市场外部性限制,非农产业发展困难。

生态环境是地区经济长足有效发展的基本保障,深度贫困地区往往也是生态环境极度脆弱的地区。根据“PPE 怪圈锁定”理论,贫困农户往往陷入生态因素制约的贫困陷阱,出现“贫困—人口增长—环境退化”的恶性循环,愈贫愈困,造成“生态恶劣型贫困”和“灾害导致型贫困”的结果。生存利益驱使之下贫困农户更是无法顾及利于后代的生态问题,过垦过牧、乱砍滥伐现象频发,生态退化又进一步降低生产效率,使得生态环境和经济效益无法均衡。

2. 社会因素的致贫机理

基础设施建设的不足是深度贫困地区的基本致贫因素。首先表现在道路的修建,交通阻断使得贫困地区在进行种植业、养殖业以及乡村旅游业的发展时后劲不足,大大提高贫困地区与外部地区的商旅成本,同时还影响了外出务工劳动力的积极性,贫困农户选择收入较低的传统农业生产,收益较高的非农收入渠道较少。交通的不便还增加了房屋建材、生活商品的运输成本,无形中增加了农户的购买支出,农户面临“进出两难”困境。饮水安全问题与贫困地区农户身体健康状况密切相关,饮水设施建设是影响深度贫困地区发展的重要因素。此外,通信网络发展滞后,使得尚未全面覆盖网络的偏远贫困地区无法共享“互联网+”技术所带来的经济红利,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等基础设施建设也和非贫困地区形成较大差异。

贫困文化和历史因素是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因素。长期生活在贫穷中的人,会受上一辈。^[3]村落文化以及周围人生活方式^[4]的影响形成特定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并继续影响下一代,从而导致贫困者陷入贫困循环和长期贫困的局面。

“中国式贫困”既是社会问题,也是历史问题。如少数民族地区,受历史文化因素影响,生活生产方式都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而长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熏陶导致贫困问题固化,生活生产方式和价值观念转变在短期之内难以实现,贫困治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落后的制度和制度短缺产生根源性贫困。发展中国家的贫困源于制度落后,制度贫困分为政治、经济、社会三个层面,涉及政治权利分配、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市场分工与管理、社会公共服务和生活保障制度等各个方面,落后的制度使得资源和要素在不同地区、不同产业和不同群体之间分配不均衡,导致个人或群体与既得利益或资源不匹配、不平等,^[5]由不合理的分配制度衍生的贫困群体被称为“制度性贫困人口”。^[6]

政府干预不足或不当降低了扶贫效率。贫困人口在一定程度上很难凭借自身能力摆脱贫困,因此适当的干预有助于贫困户改善困境,干预的主体既可以是政府或国际组织,也可以是企业或其他民间组织。我国的扶贫干预主体为政府部门,但部分地区存在机构设置冗多、贫困瞄准不精确、扶贫政策供需偏离、扶贫贷款审批程序繁杂、扶贫资金效率偏低等问题,政府干预过多使贫困户缺乏脱贫能力,过度依赖转移支付,干预不足无法激起贫困地区改变贫困现状的信心和决心。因此,承担区域经济管理责任和适度干预是改善贫困地区久贫落后的有效途径。^[7]

3. 个体层面的致贫机理

人力资本的欠缺影响教育、观念和健康状况。从微观角度看,人力资本包含技能、知识量、健康水平,通常由培训、教育等途径获取,深度贫困地区大多数贫困户受教育水平较低,素质偏低,受传统文化和习俗影响,对新鲜事物的接受较缓慢,新的生产生活方式进入周期长,且缺乏获取、吸收和共享知识的能力或机会,这种缺少知识且缺乏获取知识能力的贫困被定义为“知识贫困”。^[8]落后的观念是深度贫困地区的重要致贫原因,这种观念一方面是指农户的狭隘价值观,也包含地区领导的陈旧观念,前者决定了先进技术和生产生活方式的变迁速度和利用效率,后者对地区发展的规划和布局起到统领作用,更能影响脱贫的质量和长效性。^[9]健康状况是影响人力资本的重要因素,由身体健康形成的贫困被定义为“能力衰弱型贫困”或“健康贫困”,^[10]深度贫困地区老、弱、

病、残频发,专业技能和经验缺乏,其内在机制是公共服务设施不足,贫困群体缺少摆脱贫困的能力和机会,贫困人口收入较少,医疗和健康受到威胁,进而影响其经济活动的发展能力,从而陷入“健康贫困”的陷阱。

相关权利的不足造成权利贫困。阿玛蒂亚认为贫困不仅是指收入低,更是缺乏摆脱贫困的权利,权利贫困分为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四个方面。^[11]农民以至深度贫困地区居民遭受了权利贫困,如政治权利层面,农民数量众多,而人大代表中农民所占比例则与农民数量不匹配。经济权利层面,农民在土地交易权利和市场主体权利方面存在不平等情况,农民没有完整的财产权利。文化权利层面,农村教育资源欠缺,教育质量不高,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和比率较低。社会权利层面,农村居民在医疗、养老保障等公共服务方面具有较大缺口。因此对于发展权利的无知和误知,也是深度贫困地区居民深陷贫困的重要原因。^[12]

社会资本不足会对贫困群体产生负面影响。社会资本是个人利用社会资源摆脱贫困的重要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使贫困群体规避了贫困风险的冲击,^[13]而深度贫困地区社会资源不足,富人控制社会资源,对富人有利的社会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贫困群体社会资源的利益实现。社会资本不足使得贫困家庭缺少支持来源,并可能在贫困文化的传递中对下一代造成代际影响。另外,社会资本来自家庭收益的外部资源,一旦受损就会对就业信息和职业机会造成影响,继而导致贫困的发生。^[14]

二、贫困陷阱的生成机制

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贫困不仅表现在物质上贫困,还包括精神上贫困,它是从收入、健康、教育和生活水平等多维方面综合考量,根据不同维度的贫困程度判定,常用的贫困类型分为极端贫困、持续性贫困、代际贫困和长期贫困等。社会发展并没有沿着发展梯度模式的预期结果分布,很多地区存在“马太效应”和“累积因果效应”,即“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社会资源没有均衡流入个体手中,而发展落后的地区更容易陷入持续的深度贫困陷阱中,造成长期贫困和结构性贫困。

纳克斯的“贫困恶性循环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滞后、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来自资本短

缺,经济供需条件在宏观层面上形成低水平的循环且产生相互作用,造成经济发展无法形成质的突破,从而陷入僵局造成贫困的恶性循环。纳克斯的“贫困恶性循环理论”展示了资本要素对于贫困的影响,资本供需双方始于“低资本”而陷入“低收入”的恶性循环,循环过程的每一环节都是导致贫困的重要因素。^[15]

贫困陷阱理论进一步解释了深度贫困,该理论可分为临界点效应、制度失效和邻里效应三个层面。第一,临界点效应的贫困陷阱理论是促进经济主体增长的某些要素与阻碍经济主体增长的要素相互抵消,以致陷入贫困的主体无法达到经济增长的临界点。影响经济增长的要素包含物质和人力资本等,为消除其负面影响提高经济实力需加大地区资源和人力资本的投资力度。第二,制度失效的贫困陷阱理论主要针对长期性贫困,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资源配置效率常常会因为低效率或者无效率的制度而持续走低,因此促进制度创新、完善激励机制才是提高制度配置资源的效率,规避风险并走出贫困陷阱的重要途径。^[16]第三,邻里效应的贫困陷阱理论主要是贫困主体的现状受到周边群体的影响,纵向看父母的生活习性、思想观念对下一代的代际传递,横向看收入相似的群体自成阶层,^[17]并且会借助亲属关系转化为纵向的代际贫困。因此加大教育投资、宣传先进思想观念对于防止代际贫困十分必要。^[18]

精准扶贫过程中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旨在缩小区域差距、提高贫困地区综合实力、防止贫困恶性循环,但在实施过程中贫困主体仍受到可支配收入、健康状况、人力资本等内在因素和社会制度、社会关系网络等外部因素的交织影响,使得深度贫困地区陷入内外因素共同制约的贫困陷阱中,因此应针对深度贫困地区的发展现状和实践经验,利用贫困陷阱理论解决实际问题。

三、可行能力提升对长效减贫的作用

“可行能力”是个人有可能实现的、各种可能的功能性活动的组合,从拥有所需营养和解决可避免的灾病等处理要求,到参与社区治理拥有自尊等复杂活动或个人状态,因而贫困的本质就在于可行能力的缺失和剥夺。因此,贫困的衡量标准不仅仅依靠单纯的经济收入,将可行能力引入长效减贫研究,有利于建立新的认知视角,从根本上长效解决贫困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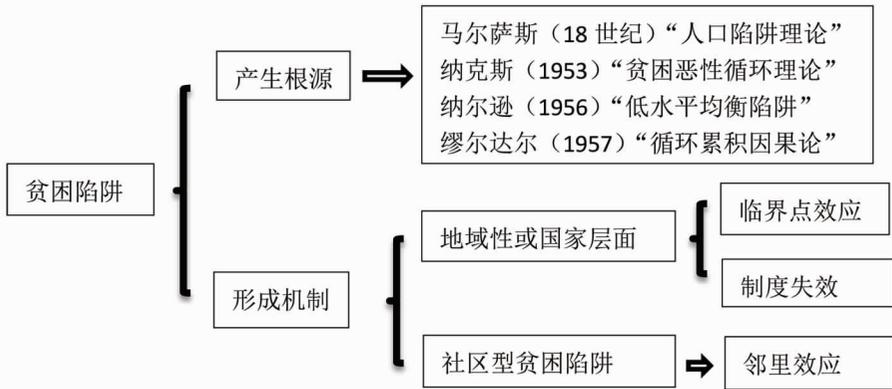


图 1 贫困陷阱生成机理图

1. 能力贫困是贫困的本质

可行能力被剥夺是贫困产生的根源。传统意义上人们对于贫困的理解就是以收入为代表的物质缺乏,现有收入无法满足日常开销,因此对于贫困的判定也简单以收入水平进行界定,忽略了贫困群体的主观能动性。阿玛蒂亚·森将贫困看作是可行能力的剥夺,收入增加是贫困治理的附加品而非最终目标,^[19]收入可能因为某种目的被隐藏,但人的行为能力和活动方式是可观察的,以可行能力判别贫困程度可以减少误判和保证贫困治理的长效性,避免激励性扭曲。可行能力倾向于生活质量,“能力贫困”可以用“健康”“教育”“生活水平”等指标进行衡量,能力贫困的提出使贫困不再聚集经济视角,延伸到摆脱困难的基本生存能力和各种可行能力,为贫困问题开辟了新的认知视角。

能力贫困影响内生性脱贫潜能。缺乏发展能力的贫困人口无法依靠自身力量摆脱贫困现状,只能依托外界帮扶,长此以往形成对转移支付和社会福利的依赖,导致缺乏脱贫内生动力,一旦脱离直接帮扶便会形成过度依赖的贫困陷阱。“人的能力和素质是决定贫富的关键”,^[20]当贫困人口通过劳动和专业技能而获得劳务报酬使得生活状况改善,无形中增加了摆脱贫困的信心和信念,从而对之后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产生深远影响。因此,自我发展能力的提升有助于激励贫困人口的内生性脱贫潜能。

能力贫困制约脱贫长效性。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全面兜底最低生活保障等直接帮扶和社会福利可以较快地改善贫困人口收入和生存现状。但从长远来看,这种外部刺激虽能缓解深度贫困,但对未完全丧失发展能力的贫困人口来说并不能从

根源上解决贫困问题。目前较为普遍的扶贫方式是提高深度贫困人口的收入水平以消除绝对贫困,培养贫困群体提升自我发展能力、提供发挥可能能力的机会则是应对“低水平动态平衡”这一相对贫困的有效手段。深度贫困群体普遍自我发展能力不足、抵御社会风险能力较弱,即便暂时摆脱绝对贫困也会因为缺乏应对各种突发情况的能力而陷入返贫风险,因此能力贫困是制约脱贫长效性和持续性的关键要素。

2. 能力建设是摆脱贫困的关键

能力建设旨在开发内生式发展。能力建设主张化“援助”为“自助”。贫困能力建设要求贫困治理走“发展式脱贫”道路,而非“救助扶贫”和“数字脱贫”,能力建设的主体包含国家、社会团体,也包括个人,通过“内”“外”兼修的方式提升可行能力实现长效脱贫。可行能力建设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主动地争取摆脱贫困的能力而非被动地接受脱贫计划,从“要我脱贫”转化为“我要脱贫”,从“参与主体”转化为“行动主体”。贫困治理是一项持久的渐进的过程,最行之有效的方式就是坚持贫困群体的“主体”地位,发挥其主观能动性,激发其主动脱贫的内生发展动力。

能力建设的主要内容是提升贫困群体的可行能力。贫困治理的本质是增强贫困人口的能力,提升贫困群体的可行能力建设对于消除绝对贫困、治理相对贫困、防范返贫风险至关重要。能力建设涉及知识、专业技术等人力资本和改善生存环境的资源资本等发展能力建设,贫困群体的能力建设应从知识文化、价值观念、行为方式和专业技能等全方面提升,增强其可行能力。

能力建设是促进自我发展能力的有效途径。能力贫困是贫困产生的根源,那么做好贫困群体

能力建设就是贫困治理的关键内容。通过能力建设形成的“开发式脱贫”一方面缓解了贫困群体的生存生活难题,另一方面规避了脱贫后因疾病、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返贫的风险,如现阶段实施的电商扶贫、旅游扶贫、教育扶贫、产业扶贫等扶贫项目都旨在提高贫困群体的发展能力,以自力更生的方式脱贫致富,通过能力建设实现自身社会价值。

能力建设的最终目的是可持续长效脱贫。贫困地区脱贫摘帽不是脱贫工作的终结,扶贫的最终目的也不是解决绝对贫困,贫困治理工作不应只关注表面的“数字脱贫”,更要做到可持续性的长效减贫。发展能力是以可持续的方式解决自身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难题,随着全面脱贫后外部帮扶资源的转变,减贫将面临更加复杂的外部环境。因此,提升贫困群体的发展能力就是促进其内生发展动力,一方面是为了保证精准扶贫工作的长效性和可持续性,另一方面也是从根源解决贫困的最有效方式。

四、构建持续减贫长效机制的政策建议

随着我国脱贫攻坚任务的完成,绝对贫困即将消除,但贫困作为一个世界性难题,相对贫困状况依然长期存在,因而必须构建一种新型长效减贫机制,做好新旧政策体系之间的有效衔接,推动减贫防贫常态化、制度化和国际化,从长远保证减贫制度正常运行并发挥预期效果。另外,需要继续完善深度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为产业发展提供相应的配套设施和后勤保障,细化产业带动作用,以产业带动贫困人口的收入改善和脱贫积极性,从而激发贫困人口内生动力和脱贫积极性,进一步提高贫困治理的精确度,因地制宜的构建地区持续减贫长效机制。

1. 加强深度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

完善的基础设施体系既可以优化深度贫困地区居民生存和发展环境,又可以为贫困农户创造更好的就业和发展机会,是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的重要治理工具。深度贫困地区基础设施薄弱使得建设难度较大,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惠及民生,应作为连接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的纽带,符合长远发展需求。为此,确保公共交通、水利电力、通信网络等全方面覆盖;完善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等基本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支持深度贫困地区将学前教育纳入基本学制,对偏远和落后地

区小学和综合教学点进行整合,加强学校校舍、文化活动中心、文体同步课程等设施建设,提高教学质量,规定医疗卫生设施的比例和规格,定期开展乡村医生的业务培训活动,保障附近居民的医疗服务水平;加大财政专项资金的扶持力度,尤其关注深度贫困地区老、弱、病、残等弱势群体的最低生活保障问题,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对口援助、以工代赈,以自食其力的方式提高贫困农户的收入,不断促进精准扶贫和兜底保障的有效衔接;继续实施危房改造和生态移民搬迁,依据实际情况制定区域危房改造标准,提高自然环境恶劣、自然灾害多发地区的房屋搬迁建设标准,从搬迁村庄布局、安置形式、公共服务、产业规划以及生态恢复与发展等层面改善贫困人口的脱贫权利和机会缺失问题。

2. 发挥产业带动作用

实现减贫工作的长效性和可持续发展最重要的是提供产业支撑。首先,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助推产业发展。深度贫困地区在地理位置上偏远闭塞,但随着外部条件的改善,其丰富的特色资源得以开发,工业基础落后反而形成良好完整的自然环境,其旅游价值、养身价值以及传统文化都有鲜明的地域特点,形成附加值较高的优势产业。因此现阶段旅游产业、民族文化产业等特色产业是推动深度贫困地区吸引外资的标志性优势,越来越多地区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地理标志产品,使之成为地区名片,不仅可以起到减贫作用,还能促进地区经济可持续增长。其次,产业发展要依循经济规律。随着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农业就业率和农业产出率均呈现下降趋势。对于深度贫困地区而言,基于当地自然资源的产业价格弹性和收入弹性小,生产规模扩大可能会导致收入减少,量化生产一方面降低资源配置效率,一方面拉低价格,降低了经济效益,手工定制和小众生产反而会获益更多;产业的发展不能拘泥于传统生产形式,要考虑地域和时间组合,以制造业带动产业发展,延长产业链,提升产业知名度,增加产业附加值。再次,合理利用政府扶持发展产业:深度贫困地区多位于偏远地区或经济辐射不到的远郊地区,受地理位置影响,可能接收的市场信息不完备不及时,因此需借助政府力量完善产业基础设施、制定市场规范准则、提供加强收益规避风险的市场信息,以此扩大产业规模,形成秩序良好的产业发展氛围;政府发挥主导作用,规划聚集产业园使

得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集中管理,便于基础设施共享、配套设施匹配、资源和信息互补,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最后,提升产品市场竞争力。培育新兴产业和特色产业,以合作社、大户联结的方式带动整村产业发展规模,突出产品绿色、有机的地域优势,将民族文化、特色饮食和传统节日和风俗元素注入产品中,形成品牌效应从而提高核心竞争力。

3. 激发贫困人口内生动力

提升教育质量旨在增加深度贫困地区贫困人群主动脱贫的资源,激发内生动力,实现内外力相互促进,实现长效脱贫的良性循环。首先,加大包括但不限于学校教育的投资力度。深度贫困地区普遍教育水平较低,贫困群体素质不高,为破除贫困的代际传递,提升地区生产力、团结力和竞争力,需加大成人教育、文化宣传,定点定时开放职业技能培训,降低普适性教育的门槛,通过民众能够接受的方式宣传国家的扶贫政策、优秀传统文化,在了解国家在教育、医疗、产业奖补等方面的扶持政策后重塑消除贫困的信心,培养自力更生、主动脱贫的价值观念。其次,针对不同致贫原因的贫困户,采取有针对性的技能培训。对于发展种植、养殖业的贫苦农户引进专业的技术指导和支 持,对失业或待业的贫困户开设就业技能培训,实施青壮年劳动力定向培养计划,继续加大贫困地区语言能力和基础知识教育,扫除文盲、半文盲,为后代营造更好的家庭环境。另外,促进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有效转化。合理配置教育资源,强化乡村地区教师队伍建设,通过设置特殊津

贴、创新教育方式、开展对口支教等方式鼓励和吸引更多高素质人才到贫困地区工作;结合地区文化习俗探索深度贫困地区的教育制度,提升深度贫困地区贫困群体的参与意识和自我发展潜力,全面消除精神贫困。

4. 提高贫困治理的精准度

深度贫困地区地形复杂、环境多变,民族文化和区域习俗各异,需要实施更加精准的扶贫政策才能保证贫困治理的可持续性。首先,要保证扶贫项目精准到村到户。扶贫项目涉及大量扶贫资金和产业资源,是帮助贫困户实现“造血”能力的重要途径,在项目的申报、审核和实施过程中,都要加大监控和调查力度,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和需求满足贫困农户的需求,使农户了解扶持政策,使扶贫资金到达贫困户手中,避免审查不严出现“精英俘获”等目标瞄准偏离问题。其次,采取差异化救助方式。针对深度贫困地区的现实状况适度调整脱贫标准,扶贫标准过高会使贫困农户陷入“福利陷阱”。有研究发现贫困户在社会福利和政府直接帮扶下生活条件甚至超过非贫困户,引发贫困户的“等靠要”惰性依赖和非贫困户的“悬崖效应”,反而会导致非贫困户的内生动力不足。此外,要特别关注边缘人口,加大对独居老人、留守儿童、光棍懒汉、智力缺陷或残疾人等特殊困难群体帮扶,对于已经脱贫但发展能力受限和高于贫困标准但有贫困风险的人口持续监测,防止因大病、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陷入贫困,防止贫困人口泛福利化情绪,完善发展援助体系。

参考文献:

- [1] 郑瑞强,徐元刚,施国庆. 连片特困区政府减贫行为供需对接障碍与机制优化[J]. 青海社会科学,2015(3):81-86.
- [2] 徐孝勇,封莎. 中国 14 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自我发展能力测算及时空演变分析[J]. 经济地理,2017(11):151-160.
- [3] 沈红. 穷人主体建构与社区性制度创新[J]. 社会学研究,2002(1):40-54.
- [4] 刘晓响,马铃. 基于多维贫困视角的农户益贫分析[J]. 农业技术经济,2018(11):56-68.
- [5] 李永前. 基于实证分析的云南藏区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调查研究——以德钦县为例[J].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19(04):153-160.
- [6] 史志乐,张琦. 教育何以使脱贫成为可能——基于家庭贫困陷阱的分析[J]. 农村经济,2018(10):1-8.
- [7] 杨龙,李萌. 贫困地区农户的致贫原因与机理——兼论中国的精准扶贫政策[J].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4):33-40,189.
- [8] 胡鞍钢,李春波. 新世纪的新贫困:知识贫困[J]. 中国社会科学,2001(3):70-81,206.
- [9] 莫光辉,张菁. 精准扶贫第三方评估长效机制建构策略——2020 年后中国减贫与发展前瞻探索系列研究之一[J]. 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6):113-120.
- [10] 莫光辉,杨敏. 2020 年后中国减贫前瞻:精准扶贫实践与研究转向[J]. 河南社会科学,2019(6):99-106.

- [11] SEN AMARTYA. Commodities and capacities[M]. Amsterdam: North Holland,1985:7.
- [12] SEN AMARTYA. Development as freedom[M]. New York:Alfred A. Knopf, 2000:21.
- [13] 钱力,李剑芳,倪修凤. 连片特困地区精准扶贫面临的问题及路径优化[J]. 区域经济评论,2018(4):107-113.
- [14] 孙鲁云,谭斌. 自我发展能力剥夺视角下贫困地区多维贫困的测度与分析——以新疆和田地区为例[J].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18(2):23-29.
- [15] 李晓宁,高晓春. 突破贫困恶性循环的“怪圈”[J].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1):75-78.
- [16] 郑长德. 深度贫困民族地区提高脱贫质量的路径研究[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8(12):103-112.
- [17] 左停,赵梦媛,金菁. 突破能力瓶颈和环境约束:深度贫困地区减贫路径探析——以中国“四省藏区”集中连片深度贫困地区为例[J]. 贵州社会科学,2018(9):145-155.
- [18] 贾林瑞,刘彦随,刘继来,等. 中国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贫困户致贫原因诊断及帮扶需求分析[J]. 人文地理,2018(1):85-93,151.
- [19] 阿玛蒂亚·森. 以自由看待发展[M]. 任贇,于真,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 [20] 周常春,翟羽佳,车震宇. 连片特困区农户多维贫困测度及能力建设研究[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7(11):95-103.

Study on Long-term Mechanism of Sustainable Poverty Reduction in Deep Poverty-stricken Area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easible Capacity

LI Jianfang¹, LI Lu²

(1.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95, China; 2. School of Urban Economics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Capital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Beijing 100026, China)

Abstract: Deep poverty-stricken areas are mostly located in remote areas with complex terrain, far away from the radiation of cities and economic growth points, harsh natural conditions and weak economic foundation.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of resolute victory in the fight against poverty, they are still difficulties and key points in the fight against poverty.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feasible capacity,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poverty-causing mechanism of deep poverty-stricken areas from the aspects of natural environment, social factors and individuals, explains the role of feasible capacity enhancement in long-term poverty reduction based on the theory of poverty trap formation mechanism, and strengthens the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in deep poverty-stricken areas, gives full play to industry-driven role and stimulates poverty. Constructing a long-term mechanism for sustainable poverty reduction in population endogenous motivation and improving the accuracy of poverty management

Keywords: availability; deep poverty areas; long-term poverty reduction

(责任编辑:沈建新)